

【学术论文】

# 合璧书写的演变与清朝的国家认同

强光美

**摘要：**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合璧书写在有清一代经历了由入关前满蒙汉三体并书，到入关初调整为满汉合璧为主，再到清中期满、蒙、汉、藏、托忒、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奠定，直至嘉道以后整体式微的演变过程。这一动态演变恰恰与清朝国家认同的萌芽、重构、确立以及稳固趋势相一致，其实质是随着“中国认同”不断强化、巩固和自觉，清朝逐步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并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为纽带，最终建立起新的“同文”秩序和大一统格局。

**关键词：**合璧书写 清朝同文 大一统 国家认同

提倡使用多民族文字的合璧书写是清朝语言文字政策的显著特征。以往学者对于不同类型的合璧文献，如图书、公文、匾额、碑刻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考订与探究，<sup>①</sup>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合璧”所具有的“同文”“共时性”等政治内涵。<sup>②</sup>但上述讨论并没有对合璧书写的演变作历史性的探讨，尤其对有清一代合璧书写的发展脉络未进行系统梳理，对不同历史阶段合璧体系内部文字的种类变化、地位消长及其背后折射出的清朝政权性质和国家认同变迁也缺乏针对性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在充分爬梳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勾勒清朝多语文合璧书写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总结其阶段性特征，进而以此考察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与满人国家认同的变迁。

## 一 三体并书：清入关前的合璧书写与国家认同的萌发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保持自身特性的重要载体，也在一个政权的政治认同构建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明朝中后期女真文失传以后，女真后裔主要依靠蒙古文进行读写。自正统九年（1444）玄城卫指挥撒升哈等奏请明廷颁发敕书之类用“达达字”之后，蒙古文正式成为明朝中央政府与女真各部首领进行交流的书面文字。万历年间，努尔哈齐在统一女真诸部、创立政权的过程中，萌生了以文字区分“国家”（满文 *gurun*）的观念，认为“我国”（满文 *musei gurun*）应该有自己的文字，

<sup>①</sup> 代表性的成果有：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赵令志《清代满汉合璧字辞书及其作用探析》，《满语研究》2009年第2期；关笑晶《清代满蒙辞书“序”研究》，《满语研究》2011年第1期等。

<sup>②</sup> 不少学者指出，多语文的合璧书写是清朝“同文之治”理念和实践的具体表现，主要见于：林士铉《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9年；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也有部分学者围绕多语合璧是否昭示着清朝的“共时性君权”（*simultaneous emperorship*）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如 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1; 钟焯：《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等等。

而非借助“他国蒙古之言”（满文 encu monggo gurun i gisun）。<sup>①</sup>由此，他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下令额尔德尼等人在蒙古文的基础之上创制了满文，尊为“国书”，颁行使用。

满文的创制和推广，是努尔哈齐致力于构建满洲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关键环节。其后，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改“女真”为“满洲”，次年建元称帝，国号“大清”，标志着满洲共同体的正式形成。但新的满洲共同体，不仅有女真人，还包含汉、蒙古、朝鲜、索伦人等不同成分。可见，满洲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共生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共同体，这就对其统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影响到政权的文字书写。早在天聪初年，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上书，指出朝政实录仅仅以满文记载实为不妥，“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建议将满文译汉，以满、汉两种文字记注，从而“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sup>②</sup>。该建议被采纳后，满汉合璧书写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如天聪四年敕建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文即系满汉合璧。<sup>③</sup>可见，使用满汉合璧书写是早期满洲统治者在多元文化传统影响及现实环境制约下的选择，是为了塑造“满汉共主”的形象，同时也凸显出此一时期政权内部满、汉两大民族的主体地位。

此后，随着联合蒙古政治方针的逐步确立，蒙古对满洲政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并深刻地改变了合璧书写格局。蒙古文不仅进入国家层面的合璧书写，甚至一度超越汉文，成为合璧体系中仅次于满文的主体文字之一。于是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的称帝大典上出现这样的景象，“满洲、蒙古、汉官捧三体字表文立于坛东，以上称尊号，建国改元事，宣示于众”<sup>④</sup>。皇帝登基乃国之大典，在仪式中，满洲、蒙古、汉官各以本族文字书写和宣读表文，寓意皇太极的政权获得了满、蒙、汉各族拥戴，是对其“天下共主”身份的一种仪式性的阐释和强调。正如黄兴涛所言，此时的“大清国虽‘首崇满洲’，却已绝非满洲一族之国，而是其主导之下的满、蒙、汉等族人民共享的国家”<sup>⑤</sup>。

自此，满蒙汉三体并书格局正式形成。崇德以后，凡国家大政大典，如颁诏仪、进表笺仪、册封仪、将帅出征仪等，俱用三体字式。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朝政实录不再仅仅用满、汉两种文字记注，而是增加蒙古文，成三体。如崇德元年修成的《太祖太后实录》，即是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编译成书。<sup>⑥</sup>此外，有关国计民生的历书，自崇德二年开始，一直制作和颁发满、蒙、汉文三种版本。与此同时，代表朝廷门面的皇家建筑上的题字以及宣扬国威的征战纪念碑，也都采用包含蒙古文在内的三体合璧式样。例如，崇德二年立于盛京皇宫大门两侧的文德、武功坊牌楼，即为满汉蒙三体合璧。始建于崇德二年的韩国三田渡碑，是皇太极为宣扬其武功而命朝鲜国王修建的，崇德四年碑成，题为《大清皇帝功德碑》，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书写，记述了清帝对朝鲜的平定与怀柔，从而彰显清朝国威。清廷在这些重大场合采用三体合璧，显然宣扬和巩固了满蒙汉三体并书的理念和制度，并以此强化“共享”政权的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蒙古文不仅成为合璧书写的三大主体文字之一，而且在内部的秩序安排上往往优于汉字，凸显了蒙古的重要地位和满蒙的亲密关系。在各种仪式和表文上，一般遵照首满文、次蒙古文、再汉文的秩序安排。例如，崇德元年孝端文皇后册立大典，诸王率满洲官上清

① 《满洲实录》卷3，己亥年二月。

② 《杨方兴条陈时政奏》，天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载《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第37-38页。

③ 关于此碑的研究，可参见李勤璞《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研究》，《满语研究》1995年第2期。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閣内密（秘）书院档案，《内外诸臣为天聪汗上尊号行礼及崇德帝率众诣天坛祭天》，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档号：01-01-04。

⑤ 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⑥ 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字表文，蒙古诸王率蒙古官上蒙古字表文，汉官上汉字表文，次第宣读。<sup>①</sup>崇德三年，在多罗贝勒岳托等人的出征典礼上，“赐敕书、印，行礼，众人跪于阶下，大学士刚林读满文敕书，理藩院承政塞冷读蒙文敕书，大学士范文程读汉文敕书”<sup>②</sup>。

入关前合璧书写格局的初步确立，反映出满洲统治者对“天下”“国家”“一统”等观念的认识，明显有别于汉族统治者。在国家和疆域治理实践中，他们并不急于构建以往汉族统治者追求统一文字的“书同文”景象，而是针对境内多民族语言和文字共存的现实，秉持“从俗从宜”方针，灵活运用多语文“合璧”这一书写模式。尽管多语文的合璧书写并非满人之创举，辽、金、元等王朝统治者也曾以政治手段自上而下推行过合璧书写，但不同的是，在合璧格局上，此前均以“国书”（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蒙古文）与汉文二体合璧为主，而清朝早期的合璧书写则呈现出另一种特征，即在“国书”满文与汉文之外，将第三种文字——蒙古文，纳入了合璧体系，形成了满蒙汉三体并书格局，且蒙古文地位一度超越汉文，表明此一时期的满洲政权不仅为满、蒙、汉为主体的联合政权，而且有较为强烈的“蒙古化”倾向，亦即学界所谓“内亚”色彩。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以狩猎、采集、农业为生的保持定居生活状态的满洲人，并不完全符合内陆亚洲游牧民族的特征，因此，将早期满洲政权视为“内亚”政权的观点尚需商榷。<sup>③</sup>不过，从地缘和文化遗产上来看，满洲人由于生活地域毗邻蒙古草原，在早期的文明发展中确实与内陆亚洲文化有着密切接触，并深受其影响，尤其在文字的使用和创制上。满洲人在未有文字之前，主要依靠蒙古字进行读写，在决心创制本民族文字之时，又抛弃了金朝女真字以汉字为模型的传统，而直接借用了蒙古字母及其拼写方法。民国时期著名的蒙古族学者、出版家汪睿昌强调，满蒙文字上的亲缘关系，极大地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其所以合满蒙为一家者，论者谓婚姻、爵禄、宗教之故，而不知文字构通之功也。满文本出于蒙文，其字头拼音大略相同，故易瞭解。凡公文上下，满蒙并重，用途亦广”<sup>④</sup>。总之，由于地缘上的毗邻，文化上的效仿，政治上的联合，蒙古因素在满洲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 二 从三体并书到“满汉一体”：清入关初合璧格局的调整与国家认同的重构

如果说，入关前合璧书写的文字选择及内部秩序显示出满人对蒙古文化的认同，具有较为浓厚的“内亚”色彩，那么此后，随着清朝统治重心的转移与统治者政治文化认同的演变，合璧书写的格局也发生了相应调整，其政权的“内亚”色彩也就越来越淡化。

顺治元年（1644），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洲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人口众多、拥有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的汉人，成为其主要统治对象，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从原先的联合蒙古，过渡到倚重汉文化，寻求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为此，以顺治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及其制度的浓厚兴趣，开始主动学习汉语汉文。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强调汉文的重要性，认为帝王在精通满文之外，还须习汉文、晓汉语，如此方能“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sup>⑤</sup>。另一方面，入关后满洲统治者正式以“中国”自居，并积极构建其统治的合法性。为了打造中原正统王朝形象，他们在政治上标榜“满汉共治”，在文化上宣扬“满汉同文”，并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03，《礼部一四·册立一·册立皇后》。

② 季永海、刘景宪译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

③ 具体分析可参考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④ 中央民族大学古籍馆藏，汪睿昌：《蒙文分类辞典序》，载《蒙文分类辞典》，1926年版，第1页。

⑤ 《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乙未。

对合璧书写的格局进行了相应调整,即在“首崇”满文的前提下,提升汉文地位,而相应降低蒙古文地位,甚至将其排除在很多重大场合之外,从而打破了原先的三体格局,满汉合璧成为主要书写模式。

首先,满蒙汉三体合璧书写的应用场合迅速收缩,蒙古文在合璧体系中的地位渐趋弱化。这一变化在祭礼上表现得最为彻底。顺治十三年,清廷规定太庙牌匾“停书蒙古字,止书满汉字”<sup>①</sup>。十四年,工部奏言:“凡各坛庙门上匾额,或从太庙例,去蒙古字,止书满汉字,或仍用旧额。”皇帝批示:“如太庙例。”<sup>②</sup>与此同时,皇家宫殿、园林等的匾额文字也由满蒙汉三体改为满汉合璧。各处匾额纷纷去除蒙古字,标志着清朝入关后在“礼制化”过程中蒙古因素的渐次退场。而以满汉合璧形式书写新的牌匾,则是清朝统治者以一种公开的姿态表明满汉在文化上的趋同,树立“满汉一体”之形象。

不仅如此,清廷的重大仪式如颁诏仪、册封仪等,也不再延续关外三体文传统,而只用满汉两种文字。在政书典要的编纂和颁发中,三体格局也逐渐被打破,蒙古字的权重下降。例如,顺治十八年,满洲统治者首次开馆纂修皇家族谱——玉牒,在文字选择上,从初次纂修,即为满汉两种文字,<sup>③</sup>而未沿用入关前三体文字的旧制。

其次,清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制度规定,推动满汉合璧书写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迅速普及,由此,满汉二体逐渐取代满蒙汉三体,成为合璧书写之主体。

顺治元年,清朝统治者甫一入关,即下令内外各衙门印信俱并铸满汉字样,其余牌符、凭文等也相应改制成满汉合璧。官方印信等物乃国家权力之象征,以满汉合璧字样铸造即是为了昭示“满汉一体”理念。顺治十年,朝鲜国王向清廷呈进表疏,皇帝批阅时发现,表疏上所钤盖的印篆仍然沿用关外旧制,只有满文,而无汉字,于是立即让礼部改铸“兼清汉篆文”的新印,颁赐给该国王使用,“并令王国臣民咸与知之”<sup>④</sup>。可见,清廷宣扬“满汉一体”理念,范围不仅限于内地,还远及诸藩。

自顺治初年开始,清廷还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谕旨,规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文书式样,将满汉合璧推广至政府文书。皇帝率先垂范,自顺治四年起,颁给直省文武官员的敕书等,兼写满汉文字。<sup>⑤</sup>顺治九年规定,各省汉官敕书,全部翻译满文启奏记档。<sup>⑥</sup>顺治十年正月又规定,今后各部院奏事,各臣照常面奏,待皇上览毕,“上批满汉字旨发内院,转发该科”<sup>⑦</sup>。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院及地方官员上呈的题奏本章开始按规定满汉合璧书写。

清廷还组织纂修满、汉两种文字的典籍,以官修图书形式确定满汉合璧的基本书写原则。如顺治二年至四年的《大清律》,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二十九年的《大清会典》,这些重要的国家律典均用满汉两种文字编纂颁行。

此外,在一些面向大众的场合增添满汉合璧元素,以推动满汉合璧书写的社会化传播。比如清廷发布的告示,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满汉合璧形式刊刻,以便人人知晓。顺治十年六月,为防止太监祸乱宫闱,清帝发布严旨,对内监管理作了严苛的制度规定,并“着刊刻满汉字告示,自王以下,以及官吏、军民人等,咸宜知悉”<sup>⑧</sup>。甚至官员的出行仪仗也有相应要求。顺治九年四月,规定诸王

① 《清世祖实录》卷105,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戊戌。

② 《清世祖实录》卷106,顺治十四年正月癸丑。

③ 孙成德:《清代皇族的族谱——玉牒》,《中国档案报》2012年2月23日,总第2270期,第3版。

④ 《清世祖实录》卷73,顺治十年三月辛卯。

⑤ 《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正月辛未。

⑥ 《清世祖实录》卷62,顺治九年正月壬寅。

⑦ 《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十年正月甲戌。

⑧ 《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六月癸亥。

以下文武官员的出行仪仗，“民公以下及满汉有棍扇者，扇上各写职衔，一半满字，一半汉字”<sup>①</sup>。这些声势浩大的仪仗应当会给道旁观望的百姓以深刻的印象。

从满蒙汉三体并书到满汉合璧，这一变化过程清晰地展现出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政治文化认同的演变。汉字在合璧体系中地位的明显上升，是他们对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国”认同日益加强的充分表现。由此，清朝的“中国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与满汉文并立的蒙古文，入关后的使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但在清朝合璧书写体系中持续在场并始终保持着重要地位。满蒙汉三体合璧依然在各种场合尤其在宫廷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帝后的徽号、庙号、谥号等的书写。皇家陵寝的匾额、碑刻，以及紫禁城内慈宁宫门额等，并未依照太庙之例书写满汉合璧，而是保留三体合璧的祖制。显然，清帝借此表明，满蒙一家的亲缘关系始终如故。不仅如此，在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以及与俄罗斯、哈萨克等周边国家交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发挥蒙古文的媒介作用，大量使用包含蒙古文的不同形式的合璧书写。由是观之，在清朝大踏步迈向“中国化”的进程中，蒙古已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 三 “同文之盛”：清中期六体合璧格局的奠定与国家认同的确立

经过几代帝王的开拓与经营，至乾隆时期，清朝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疆域空前广袤。清朝统治者在历次征战及经营边疆的过程中，注重利用当地民族文字，以强化沟通联络。随着清朝势力的不断西进，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字进入官方视野，成为合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文是进入合璧体系较早的民族文字之一。清廷由于扶持藏传佛教、强化西藏治理的需要，在相关领域的合璧书写中大量引入了藏文。乾隆帝用兵大小金川期间，还使用包含藏文的合璧书写以抚慰地方土司。例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二月，因绰斯甲布土司工嘎诺尔布“尚属恭顺”，特颁嘉奖谕旨一道，“兼用清字、蒙古字、西番字三体书写，俾知中朝治普同文，倍深感畏”<sup>②</sup>。谕旨中包含了当地人使用的“西番字”（即藏文）、蒙古文，是清廷在西南一带宣扬、塑造国家“同文”一统形象的重要手段。

托忒文和察合台文则随着清朝势力向西北拓展而被重视。清朝统治者不仅在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乱等战争期间因地制宜使用上述文字，在战争结束后，更是以建造碑刻、发行官币等国家行为承认了它们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合璧书写体系。自乾隆二十年（1755）起，清廷相继在伊犁地区刻立《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等多处纪功碑，均为满、汉、蒙、藏四体合璧，其中的蒙文即托忒蒙古文。这是清廷公开使用包含托忒文在内的合璧书写的主要场合之一。流行于新疆的察合台文，则被清廷用于铸造新疆官钱、镌刻清真礼拜寺碑等重要场合。乾隆二十四年，叶尔羌官局鼓铸乾隆通宝，“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sup>③</sup>。“回字”即指察合台文，因此新疆制钱为汉、满、察合台三体合璧。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亲自撰写的御制文《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碑文用满、汉、蒙古、察合台文四种文字，阐明清廷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怀柔政策。<sup>④</sup>

① 《清世祖实录》卷 64，顺治九年四月庚申。

② 《清高宗实录》卷 922，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癸酉。

③ 《清高宗实录》卷 593，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

④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载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2-293 页。关于此碑的内容及阐释，可参见王东平《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载《西域研究》2007 年第 2 期。

由于多种文字的加入,至乾隆中期,合璧书写体系突破了清初以满汉合璧为主、满蒙汉合璧为主流的二体、三体格局,向着更为复杂的多语文并立格局发展。与此同时,面对广袤的疆域和多元的族群,清朝统治者试图以多民族语文合璧,重新构建起大一统的“同文”秩序。不过,此时的“同文”之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以往注重统一文字的“书同文”理念不同的是,清人认为,同文的要义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文字的“义理”,“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sup>①</sup>。因此,不同文字只要表达相同的“义理”即可。至于“义理”的内涵,乾隆帝也有明确解释:“因悟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无不戴天而履地,无不是是而非非,无不尊君上而孝父母,无不贤贤而恶小人。”<sup>②</sup>很显然,这是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道德教化。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清朝统治者重新界定了“中国”的内涵。他们认为,本朝实现了新的大一统,是“有造于中国”。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有言:“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sup>③</sup>可见,在清朝统治者的语境之下,中国是多民族一统的国家,不同族群在保留各自风俗和语文差异情况下,只要诚心向化,即尊奉本质相同的道德教化,即可纳入“中国”之范畴,成为“大一统中国”之一员。由此,“中国”的外延也扩大了。而此一时期清朝统治者的“中国”认同,则突出表现为在不断拓展疆域的同时,将不同民族文字先后纳入官方合璧书写体系,以此宣扬“国家一统同文之盛”<sup>④</sup>,并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文化工程,整合各族群的意识形态,构建共同的王朝国家认同。

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即启动以多语文合璧书写为中心的大型图书编纂活动,以此打造“同文之盛”景观。乾隆年间,清廷组织大批人员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先后添加汉文、蒙文、藏文和察合台文,增纂为满汉二体合璧《御制增订清文鉴》、满蒙汉三体合璧《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蒙汉藏四体合璧《御制四体清文鉴》,以及满蒙汉藏察合台五体合璧《御制五体清文鉴》。系列《清文鉴》以多种文字叠加的动态,勾勒出清朝合璧体系的演进轨迹,也生动展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过程。

而乾隆二十八年修成的《钦定西域同文志》,不仅奠定了合璧书写的最终格局,更是清朝统治者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建设基本完成的重要标志。该书使用了六种文字,“始以国书,继以对音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缀书”<sup>⑤</sup>。这实际上是以官方修书的形式,正式承认了上述文字的合法身份,同时还钦定了各文字之间的尊卑序列,即以国书满文为尊,其次为汉文,再次为蒙、藏、托忒、察合台文。由此,满、汉、蒙、藏、托忒、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最终奠定。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sup>⑥</sup>。说明在清朝构建的“同文”秩序内,满文虽有“首崇”地位,但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才是“同文”之核心。

此后,许多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义的石碑、匾额,也相继改用五体乃至六体合璧书写。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乾隆帝在巡视盛京、恭谒祖陵时,下令将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一律改为

① 《钦定翻译四书五经提要》,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1页。

②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4册,第7-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1188,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己亥。

⑤ 《钦定西域同文志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5册,第1页。

⑥ 《钦定西域同文志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5册,第1页。

石碑，“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sup>①</sup>。同月，又将盛京大清门两旁所立下马木牌改为石碑，照皇陵之例，镌刻五体字。<sup>②</sup>北京的国子监、孔庙、历代帝王庙、大高殿等处的下马碑文，则为满、汉、蒙、藏、托忒、察合台六体合璧。而扩建以后的热河避暑山庄正门御题“丽正门”三个字，则用汉、满、蒙、藏、察合台五体合璧镌刻，正如乾隆御制诗所言：“岩城坤垠固金汤，诎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此处多语文合璧象征清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功绩。可见，对于这些皇权的象征物，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有意识地在早期满蒙汉合璧基础上，增添新附疆域的民族文字，以寓意清帝“天下共主”身份，宣示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 四 嘉道以后合璧书写的整体式微与清朝国家认同的稳固

嘉道以后，合璧书写作清朝统治者巩固和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与认同的重要手段，持续发挥着作用。例如，清廷重要文书尤其是皇帝诏书，直至晚清时期仍然遵循满汉合璧书写原则，如此方显郑重。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诰敕文书和封赏名号。至于皇家陵寝等地的匾额、碑刻等，则始终保持着满蒙汉三体合璧的祖制。此外，武英殿先后于道光十六年（1836）刊刻满汉合璧《清汉对音字式》、同治年间刊印满蒙汉三体合璧《三合圣谕广训》等，表明合璧图书的编纂工作并未停滞。

然而，合璧书写在此阶段仍呈现出整体式微之势，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乾隆年间确立了象征“同文之治”的六体合璧体系后，清廷的疆域及民族格局趋于稳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基本奠定，此后清廷停止了此类大规模的文化整合工作，由此官方合璧图书数量、种类较之此前大量减少。从合璧的语种来看，嘉庆以后清廷极少使用五体或六体书写，也没有再编纂过像《钦定西域同文志》《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样多语种合璧的大型官书。就图书数量和内容而言，不仅总体书目锐减，而且普遍缺乏改进和创新之处。有学者根据（光绪）《大清会典》载录书籍进行过统计，发现嘉庆朝翰林院编校的书籍，不及乾隆朝的一半，且约一半以上为续纂或重修。<sup>③</sup>

二是随着满洲人满语文能力的急剧下降及对汉文的熟练使用，各级政府公文满汉合璧书写制度难以为继。其中的满文部分渐渐荒废，甚至被抛弃，代之以纯汉文书写，制度规定遂形同虚设。嘉庆五年（1800）四月，盛京将军傅森在查办奉天府尹恩明家人及太监沿途勒索一案时，发现该衙门档案并未按照清廷定制书写满汉文合璧，而衙门内存贮档案也没有兼写满文，显然奏折漏写满文并不始于恩明，而是早有先例。<sup>④</sup>由此不难推测，至少从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起，奉天府就出现了将满汉合璧奏折等档案改为纯汉文书写而减省满文的情况。奉天府位于满洲人的龙兴之地，系清廷对“国语骑射”要求最严之地，其官员历来按规定应以满文或满汉合璧奏事。即便如此，奉天官员仍然出现废止满汉合璧书写而单用汉文之事，那么其他地区的情况便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臣工上呈的题本、奏折来看，合璧书写似乎恰恰在满语文开始衰落的乾隆中后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发展。以《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为例，康熙朝题本全部以满文书写，顺治、雍正两朝满文、满汉合璧各半，而乾隆以后的题本，则绝大部分为满汉合璧。<sup>⑤</sup>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188，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己亥。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189，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乙巳。

③ 乌兰其木格：《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4-175 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五年四月初九日。

⑤ 参见大连图书馆编：《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年版。

而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官员满语文能力普遍下降，导致某些原先要求使用满文奏事的制度难以执行下去，面对此种困境，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策略。咸丰三年（1853）八月，热河都统毓书奏报粮价时，皇帝要求，以后每月奏报粮价，用满汉合璧折，其余如巡查七道岭情形等一切“照例事”，也照此使用满汉合璧折。<sup>①</sup>这就意味着，皇帝对于八旗官员奏报雨雪粮价、日常巡查等“寻常事件”，已不似此前那般严格要求以满文书写，而是充分发挥合璧书写象征性与实用性的双重功能，即一面默许官员用汉文上折，一面又要求在书写汉文的同时兼用满文，以维系“国语”的尊崇地位，遂成合璧。具体操作中，许多官员往往先拟写汉文部分，再由笔帖式翻译满文附上。显然，在这样的一份奏折中，汉文具备沟通交流的实用价值，发挥了通用文字的作用，而满文则大多出于象征意义。

到了清末太后主政时期，由于慈禧本人并不通晓满文，从而直接导致清廷在题本、奏折等公文的书写中彻底放弃使用单一满文的传统。咸丰十一年十月，清廷接连发布两道谕旨，要求以后“京外各衙门遇有清字奏事折件，均用清汉合璧式样”；臣工呈递给两宫皇太后和皇帝的请安折，“其应用清字者俱用清汉合璧”<sup>②</sup>。这两道谕旨，实际上是将文武官员所有奏折中需要用满文之处，一律改为满汉合璧。光绪帝即位后，清廷重申了这一制度规定。<sup>③</sup>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慈禧太后主政，短时期内扩大了满汉合璧书写的普及范围，但同时又加速了满语文的消亡。

由是观之，正是由于以慈禧太后、八旗官员为首的满洲人自身满语文能力的普遍弱化，合璧书写在嘉道以后出现不可逆转的颓势，而清末公文书写中满汉合璧的普及，则进一步削弱了满语文的“国语”地位，汉语文作为族际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实际发挥着沟通交流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国语”观念传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汉语“官话”定为“国语”。宣统三年（1911）清廷颁布《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官话”为基础的“国语”正式得到官方认可。至此，清朝的“国语”完成了从满语到汉语（官话）的转型，这一过程“隐含了满族旗人的中华化过程，伴随着族群政治认同的变化”<sup>④</sup>。也就是说，满语文的衰落与清末“国语”变迁，不仅体现出时人对于“国语”概念认知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包括满洲人在内的清人对于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国”认同的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多语文的合璧书写出现整体式微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以上论述可知，合璧书写已经内化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彰显其国家认同的重要风向标。有清一代，合璧书写及其格局不断发展演变，这一动态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是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原文化圈，最终重建起新的“同文”秩序，实现并巩固大一统格局的历史全景。在此过程中，清朝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其“中国认同”也在不断强化、巩固和自觉。

**【项目说明】**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代官方多语文合璧书写及其政治文化意义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9YJC770032。

（作者 强光美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讲师 邮编 100083）

（责任编辑 赵增越）

① 《清文宗实录》卷102，咸丰三年八月丁丑。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③ 《清德宗实录》卷1，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庚辰。

④ 张军：《满族的语言认同与清末“国语”转型》，《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3期。